

文献保护

专刊

Document Protection Issue

主办：国家图书馆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图书馆报

2020年7月24日

第13期

06-07 业界动态

湖南正式实施《古籍保护与服务规范》
《古籍保护人员名录·修复师卷》编纂工作正式启动

08 镇馆之宝

太原市图书馆馆藏珍本选介
史料珍贵 书品一流

09 业务探讨

浅谈“揭补”技艺在古籍修复中的运用
以修补《魏书》零页为例

10-12 图书推荐

满足读者对民国时期文献数据的实时查询需要
《民国时期图书总目》编纂情况

凸显小学之要 助力汉字传播

《珍本玉篇音义集成》出版概况

走近明清之际的“百科全书派大哲学家”方以智

远可鉴历史,近能征实事

《近现代汉语辞源》编写缘起

《梁书》修订本:古籍整理事业的又一重要成果

展现朱子对东亚文化圈深远影响之作

《朱子感兴诗中日韩古注本集成》出版情况

湖南正式实施《古籍保护与服务规范》

本报讯 7月2日,由湖南图书馆编纂的《湖南省》《古籍保护与服务规范》正式实施,这是国内第一部有关古籍保护和服务的地方性标准。

此次实施的《古籍保护与服务规范》于2020年4月正式发布,主要内容包括前言、引言、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基本原则与要求、古籍征集、古籍普查登记、古籍分级保护、古籍典藏(包括书库建设、书库管理、铃印与书标)、古籍修复(包括破损定级、修复原则、修复机构与人员、修复方案、修复工艺、修复档案等)、古籍缩微与数字化(包括古籍缩微化、古籍数字化及其相关制品的保存与利用)、人才队伍建设、古籍服务(包括古籍咨询、古籍阅览服务、古籍宣传展示活动、古籍开发利用如整理研究、文创产品开发等)等部分,旨在建立健全古籍的保护和管理制度,规范古籍保护和服务的术语和定义,确定湖南省古籍保护和服务的总则,建立古籍征集、原生性保护、再生性保护、服务资源、服务人员、服务项

目、服务效能等方面的原则和标准,以加强对全省古籍行业规范化、标准化、科学化的管理,促进对古籍的保护研究和合理利用。

湖南省古籍资源丰富,藏于全省境内的古旧文献达200万册,主要集中在湖南图书馆、湖南师范大学图书馆、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部分散布于省博物馆、省档案馆、岳麓书院以及邵阳市、衡阳市、新化县等市县图书馆和私人藏书家中。经过十余年的共同努力,全省古籍保护事业有了长足发展,目前,《湖南省古籍联合目录》的编纂已进入收尾阶段,《中华古籍总目·湖南卷》有望在两年内全面完成,古籍分级保护、古籍的人才培养、古籍的宣传推广、古籍的整理出版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然而当今形势下全省古籍的保护和利用发展仍然存在法制建设不完善、标准化建设不够全面、古籍内涵揭示不足、市县级单位古籍保护工作缺乏人才保障等困境。

为了不断提升全省古籍保护水平,切实发挥古籍传承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作用,积极响应《“十三五”时期全国古籍保护工作规划》和《“十三五”时期湖南省古籍保护工作规划》的文件精神,课题组深入基层,对邵阳市图书馆、邵阳学院图书馆、衡阳市图书馆、湘潭市图书馆、新化县图书馆等单位进行了扎实的实地调研,与长沙理工大学合作展开湖南图书馆库房环境对古籍纸张性能影响的研究,并将全省古籍保护的工作素材汇总成《湖南省古籍保护与服务案例材料选编》一书,经过草案制订、广泛征求意见、不断修改,终于编写出这一针对性强、地方特色显著的古籍保护地方性标准。

《古籍保护与服务规范》强调保护和服务并重,强调古籍的文化服务功能,它的出台有着一定的创新价值和现实意义,对于保护湖湘大地的珍贵古籍、促进古籍保护的科学发展将发挥重要推动作用,同时也标志着湖南在制定地方性古籍保护法律法规方面迈出了试探性的一步。

福建省古籍保护中心专家赴上杭县图书馆指导古籍保护工作

本报讯 7月13-17日,由福建省古籍保护中心专家许建平副主任带队,古籍普查业务骨干张美莺、林益莉,修复师金玥四人组成的工作小组,受邀前往上杭县图书馆开展相关鉴定、普查登记著录和抢救性修复等古籍保护工作。

专家组一行详细考察了上杭县图书馆古籍保护工作室与特藏书库后,对图书馆的馆藏古籍进行了鉴别,专家组认为上杭县图书馆古籍馆藏量多,有些尤其珍贵,能充分体现客家民俗与文

化。副主任许建平还对灵台山的雕版印刷木刻板进行了鉴别,认为此雕版印刷木刻板很珍贵,非常有价值,建议上杭县图书馆建设特色馆藏、组织相关活动,让读者体验雕版印刷的工作流程。

修复师金玥重点向上杭县图书馆特藏室工作人员教授了拓印技术,并就拓印手法、力度等技巧进行了手把手的指导。古籍普查业务骨干张美莺、林益莉则教授了古籍普查平台的录入方法,帮助上杭县图书馆完善馆藏古籍普查登记,提高了上杭县图书馆的古籍整理水平。

工作间隙,专家小组与上杭

县图书馆馆长郭晓红、特藏部主任林秀珍等人进行了座谈交流,专家组一行对上杭县图书馆在古籍收集、修复以及保护方面所做出的努力表示了肯定,郭晓红向专家组一行对上杭县图书馆古籍保护工作的大力支持表示了由衷的感谢。

通过与专家的交流,上杭县图书馆在古籍及特藏文献的保护、整合、宣传、利用等工作上拓宽了思路。专家组耐心细致的工作指导,也为上杭县图书馆后续的古籍保护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线装本文渊阁《四库全书》在杭州展出

本报讯 古色古香的木质外包,干净整洁的手工印刷,近期线装全套文渊阁《四库全书》在浙江杭州展出。据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套丛书将对民众免费开放,各界人士均可来“西湖会客厅”阅读、研究。

《四库全书》由清乾隆帝召集360多位官员、学者,历时十余载编纂而成。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共有3500多种书、7.9万卷、3.6万册,基本囊括中国古代所有图书。编撰结束后,《四库全书》共抄录七套,但因屡经战火,七套中的三套已荡然无存,仅文渊阁本、文津阁本、

文溯阁本传世至今。文溯阁本在战火中多处残缺,后经补抄,基本补齐,现藏于浙江图书馆。

此次展出的是文渊阁本线装版。该套书由故宫博物院监制,鹭江出版社出版。全书为大八开,共1184册,分装148函,采用木质外包和手工印刷、手工装帧等工艺。

该套丛书的收藏者,为杭州吉尚生活创始人张国礼。在她看来,将线装全套《四库全书》供各界人士查阅与研究,是企业服务、反哺社会的表现。“它存在的意义不是束之高阁,而是让更多人一起研读经典,追溯历史。”

《四库全书》保存了中国历代大量文献,有很多是珍贵善本,包括宋元刻本或旧抄本。还有不少是已失传很久的书籍,也有的是从古书中辑录出来的佚书。

“这套书重约1吨,是原版藏书规模的八分之一。尽管它并非原物,但也再现了当年《四库全书》的风采,是文化的延续。”江西白鹿洞书院常住、传习导师刘长焕说,浙江图书馆有文溯阁本《四库全书》,如今线装全套文渊阁《四库全书》再次落地杭州,供民众阅读,可谓是传统典籍再入“寻常百姓家”,具有别样的意义。

第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推荐名单公示

本报讯 6月23日,文化和旅游部将第六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推荐名单进行公示,共有23家古籍保护单位入选推荐名单,包括国家博物馆、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天津博物馆、唐山市图书馆、哈尔滨市图书馆、沈阳市慈恩寺、鄂尔多斯市图书馆、巴彦淖尔市图书馆、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安庆市图书馆、宁波市图书馆、浙江省平湖市图书馆、浙江省余姚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广东省社会科学院、西安碑林博物馆、西北师范大学图书馆、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张掖市甘州区博物馆、四川省图书馆、楚雄彝族文化研究院、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图书馆、云南师范大学图书馆、青海省图书馆。

同时,文化和旅游部还公示了第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共有752部珍贵古籍入选推荐名单。

甘肃省古籍保护中心专家赴陇东开展古籍普查督导工作

本报讯 6月15-22日,甘肃省古籍保护中心组织专家团队一行6人,赴平凉、庆阳各地古籍收藏单位,开展了古籍普查的调研、督导和扫尾工作。

此次普查督导工作由甘肃省图书馆副馆长李芬林带队,先后赴平凉市甘肃医学院、职业技术学院、庄浪县图书馆、泾川县图书馆和庆阳市环县图书馆、镇原县图书馆、陇东学院图书馆等7家古籍收藏单位和2家私人藏书机构督导普查工作。根据各

馆工作的实际情况,督导组对普查人员力量薄弱的基层图书馆采取专家协助的方式进行集中扫尾;对新发现的古籍收藏单位进行馆藏摸底和归类整理,通过现场培训启动古籍普查;对沿途遇到的私人收藏情况进行调研了解,提出规范保护整理的建议。督导组一行,通过分头行动和专家现场指导,完成9家公私收藏单位古籍整理和著录400余部,培训基层工作人员80余人次。此次督导工作推进了全省古籍普查收尾的进程。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督导组到兴宁馆调研指导古籍文献保护工作



本报讯 7月14日,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首席研究员刘洪辉,副馆长、省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倪俊明,省古籍保护中心秘书长林锐,省立中山图书馆特藏部副主任肖玲一行,到兴宁市图书馆调研指导工作。

一行人到兴宁市图书馆古籍室,了解古籍文献保护情况,指导馆藏古籍文献普查登记,建立古籍普查登记目录,并要求进入中心馆网站或通过其他方式向社会公开,实现共建共享。

据了解,兴宁市图书馆在民间发现有清乾隆及民国时期、解放初期兴宁各地的地契、房契,以及兴宁周边地区的历史文献等约300份。

兴宁馆有意征集这批文献,为鉴别这批文献的历史科研价值,特邀请省立中山图书馆督导组对原件进行现场鉴定。经鉴定,此批地方文献具有一定的历史和科研价值,颇为难得,值得征集,对充实馆藏,挖掘红色文化、兴宁历史文化资源,提升兴宁文化软实力,均有积极意义。

《古籍保护人员名录·修复师卷》编纂工作正式启动

本报讯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由政府主持开展的古籍保护工程,人才培养是其中的重点工作之一。十余年来,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已培训古籍普查、古籍修复、古籍数字化等专业人员超过1万人次。特别是全国古籍修复人员从“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前的不足百人发展到近千人,至2019年全国已累计修复古籍360余万叶。为促进古籍保护人才队伍建设,为国家开展文化遗产保护工程提供参考信息,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将联合各省级古籍保护中心和相关古籍收藏单位开展《全国古籍保护人员名录》编纂工作,征集“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开展以来全

国范围内的古籍管理人员、古籍普查人员、古籍修复师、古籍保护专家学者、藏书家和相关企业、古籍保护志愿者等古籍保护人员情况。同时,建议各地借此开展本省古籍保护人员情况梳理工作。

鉴于古籍修复人员队伍成长迅速、工作成效显著,第一期拟编纂出版《全国古籍保护人员名录·修复师卷》并附录全国古籍修复机构名录。名录将以客观真实、突出成果、体现师承为原则,征集从事古籍修复工作的修复师及相关非遗技师信息,同时汇总全国古籍修复机构名单,并对每个修复机构做简单介绍。征集范围包含自“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开展以来所有公藏单位从事

古籍修复工作以及在古籍保护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民间修复机构中的修复师(包括退休和离世人员),古籍修复相关行业的非遗技师,例如传拓、雕版、装潢等;“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开展以来所有公藏单位已有和新建的古籍修复机构,包括自愿加入的档案、文物系统单位,以及在古籍保护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民间修复机构。

《古籍保护人员名录·修复师卷》编纂工作已于7月初正式启动,拟于一年内完成。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将总结经验,继续联合各省级古籍保护中心和相关古籍收藏单位开展《古籍保护人员名录》其他分卷的征集编纂工作。

《河南历代方志集成》入藏河南省图书馆

本报讯 7月13日,河南省地方志办公室向河南省图书馆捐赠大型方志文献《河南历代方志集成》全套共计565册。这套大型河南历代综合性志书正式入藏河南省图书馆。

《河南历代方志集成》是由河南省委省政府批准立项、河南省史志办主持实施的大型方志文献。该书以传承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宗旨,以现行河南行政区划为边界,分省志卷和18个省辖(管)市卷共19卷565册(另附总目1册),汇编影印了现存上起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下迄新中国成立(1949年)五百余年间河南历代综合性方志共586种,内容涵盖这一时期河南自然、社会、人文、经济的发展变迁,是迄今为止研究河南最真实、权威的文献史料。

捐赠仪式上,河南省地方志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管仁富对《河南历代方志集成》的学术价值和文化价值进行了介绍。他



说,《河南历代方志集成》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历代方志集成的首次大规模整理,最终成书遵循“旧志如旧”原则,在综合志书收集方面几乎做到了应收尽收,内容涉及明代至民国年间疆域、山川、风俗、户口、田赋、艺文等诸多方面内容,收录范围广泛、版本珍稀、亮点纷呈、看点

突出,具有重要的文献史料价值与学术研究价值。《河南历代方志集成》的出版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对于河南史志事业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不仅为河南构筑全国重要文化高地奠定了基石,也为中原文化走出去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2020年“首届全国大学生中华典籍文化保护与传承大赛”启动

本报讯 近日,由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中山大学国家文化遗产与文化发展研究院主办,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团委承办的“首届全国大学生中华典籍文化保护与传承大赛”正式启动,大赛主题为“文脉赓续,传承创新”。

本次竞赛旨在引导与鼓励大学生利用专业知识和技能,研究、探索中华典籍的保护与传承的相关议题,发掘中华传统文脉的丰富内涵和新生活力,提升相关专业学生的专业学习热情与职业认可度,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与团队合作精神,提升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同时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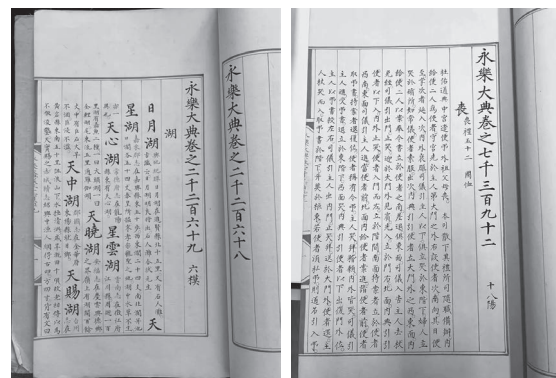
强大学生的文化自信,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教育教学全过程,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本次竞赛共设三个单元,分别为:学术论文征文单元、典籍文化保护与传承提案单元和典籍文化创意设计单元,单元设置充分考虑了学术性与趣味性的统一。在初赛阶段,每所参赛高校每个竞赛单元可通过校内选拔或者其他方式选出1-3份作品作为初赛参赛作品,并推荐其队伍参加初赛。每个竞赛单元总分前八名的队伍晋级全国总决赛。入围决赛队伍参赛可享受资助,于决赛当天按照竞赛单元进行现场展示和答辩,最后决出一、二、三等奖。典籍文化保护与传承提案

单元和典籍文化创意设计单元在决赛阶段还会进行线上人气队伍评选,各自评出最佳人气奖一组。9月1日起,各参赛高校即可启动校内选拔,决赛时间暂定为今年11月中旬。

本次竞赛面向全国“双一流”建设高校和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合作院校的在校本科生;学术论文征文单元面向对象可放宽至硕士研究生,如论文有多名作者,研究生作者数量不得超过1人;学术论文征文单元仅限图书馆学专业学生参赛。更多竞赛详情可关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微信公众号、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微信公众号或者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团学微信公众号。

两册《永乐大典》在法拍出640万欧元



本报讯 《永乐大典》是明成祖朱棣下令编撰的全世界最早的一部百科全书,共有11000余册,比法国的百科全书早300年。但是,经过战乱和磨难,存世的《永乐大典》400余册散落于世界各地。法国巴黎当地时间7月7日下午4时47分,两

册《永乐大典》在巴黎知名德鲁奥拍卖公司二号拍卖厅举拍,经过11分钟的激烈竞拍,最终由现场的一位中国女士以640万欧元的净价拍得。据悉,德鲁奥的拍卖佣金为27%,因此,两册《永乐大典》的最终成交价为812.8万欧元。

四川省图书馆与新华文轩共建四川历史名人文献馆

本报讯 为贯彻落实四川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施意见》和四川省委宣传部《实施四川历史名人文化传承创新工程的意见》,四川省图书馆与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合作暨共建四川历史名人文献馆签约仪式于7月17日在四川省图书馆举行。

四川省图书馆党委书记、馆长何光伦指出,四川历史名人文献馆的建设是以巴蜀文献资源为基础,以四川历史名人为脉络,重拾川人历史记忆、文化记忆、精神记忆,使名人文献与名人文化

真正“活”起来的重要手段。省图书馆将与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携手,本着“传承文明、服务社会”的原则,加强对四川历史名人文献资源的整理、保护与开发利用,充分发挥文献资政、传承育人的作用,促进四川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繁荣发展。

据悉,四川历史名人文献馆将设置在四川省图书馆五楼东侧,面积为1300平方米,该空间为永久性文库和展场,以“因地制宜,立足文献,着眼传承,共建共享”为基本原则,以深厚的馆藏文献资源为基础,尤其是古籍与民国文献,系统发掘、梳理历史名人资源。

《俞樾全集》首发座谈会在德清举行

本报讯 近日,德清县图书馆、浙江古籍出版社、乾元镇文化站在俞樾的家乡浙江省德清县乾元镇联合举办《俞樾全集》首发座谈会。

在古代德清籍文化名人里,俞樾堪称首席,“拼命著书”。《俞樾全集》收录了俞樾现存的所有文字作品,在《春在堂全书》基础上又增补了书信、日记以及佚文等新材料,分编为32大册,为俞樾著作的首次系统整理,并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

“浙江文丛”编辑室主任路伟表示,《俞樾全集》列入“浙江文丛”出版不仅是浙江古籍出版社的一种光荣,也可以说是浙江文化界的一件大事。得知《俞樾全集》问世,俞樾后代亲属出资购买并向乾元镇金火村捐赠了一套《俞樾全集》,作为筹建中的德清俞氏纪念馆的重要馆藏。图书首发当日,德清县图书馆还组织与会嘉宾赴俞樾老家金火村走读了在建的俞氏纪念馆、刻有俞樾楹联的四仙桥以及乌山庙石碑坊。

太原市图书馆馆藏珍本选介
史料珍贵 书品一流

太原市图书馆建馆历史悠久,文献种类丰富,在全国地市级图书馆名列前茅。截至2016年底,馆藏国内外纸质文献资料总量140万册(件),其中古籍10万余册(含善本近1万册),另外新馆购进《中华再造善本》一、二期共1341种2377函13395册,另5轴11册叶。馆内还藏有《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毛泽东点评二十四史》等珍贵文献。此外,约295.1TB数字文献资源及海量共建共享资源供读者阅读,其中《中华再造善本数据库》《中国历史人物数据库》《民国时期文献总库·民国图书数据库》(一、二期)等古籍数据库,也为读者提供远程阅读。本次特选介两本太原市图书馆的珍藏文献《续夷坚志》和《硯北草堂诗稿不分卷》。

《续夷坚志》

《续夷坚志》是金代山西人元好问的文学作品。

元好问(1190-1257),字裕之,号遗山,金元年间著名文学家,山西秀容(今山西忻州)人。祖出北魏鲜卑拓跋氏,金宣宗兴定年间中进士,官初拜南阳等地县令,后至尚书省左司员外郎。金亡于蒙古后,元好问以遗民自称,隐居乡里不仕于元。他竭力收集金朝历代以来的文学历史资料,编辑为金诗总集《中州集》传世。其中保存了金代极其丰富的历史人文资料,并开创了以诗记史的文学体裁,是其流传至今最为著名的文学著作。另有《续夷坚志》、《壬辰杂编》(已佚)、《元氏集验方》(已佚)等杂著,后人将其遗文合编为《遗山先生全集》传世。

《续夷坚志》为元氏晚年所辑。文章体例仿照南宋洪迈(1123-1202)所著的笔记体小说《夷坚志》,记录了当时的神仙鬼怪、轶闻杂事、名士传奇、诗词歌赋及药理医方等内容。全书现存四卷,共辑录条目203则(其中原书207则,有目无文者4则)。

《续夷坚志》里的故事主要来源于作者的亲身经历,或为其从朋友、亲戚或属下口中所听闻的轶闻杂事。如卷二《王氏金马》,记述为“兵乱之后,予曾见之”;卷三《陵川瑞花》回忆了其少年时随父于官解作《瑞花诗》的情景等。作者从朋友、亲戚或属下口中所听闻的轶闻杂事,数量有七十余条。如卷一《金狮猛》末尾记述,其得自“圣俞说”;《王增寿外力》末尾记述,为“樊帅说”,等等。

其次,是作者删节转录他人文章而来,有二十余条。如卷一《稻画》,叙述西京田叟以稻桦皮作《尧民图》等奇迹,末尾记“事见平阳都运使张伯英文”,等等。

再次是选自作者的其他著作,出自其所辑诗史名著《中州集》,如卷一的《敏之兄诗讖》《申伯盛诗兆》《王云鹤》等十三则。

然而,此书却流传不广,在元代或有刻本,但已失传。明代无刻本,仅以抄本递藏于世。直至清中期方有刊刻,即清嘉庆十三年(1808),杭郡学者余集根据荣庆读易楼所藏的王起善抄本,整理并重订为四卷并附元氏本传、年谱于后,刊刻流传,史称“大梁书院本”。这是《续夷坚志》现存最早的版本。太原市图书馆所藏即为此本,全书手写上版,白纸精印,书品一流,可谓精善之书。清道光十年(1830),荣庆之子荣誉又据大梁书院本重刻,并收入其所刊《得月楼丛书》。其后此书又被收入平定张穆所辑《元遗山先生全集》及海丰吴重熹所辑《汇刻九金人集》。民国后,又出版有扫叶山房本、《笔记小说大观》本、《丛书集成初编》本,但内容均得自大梁书院本或其得月楼翻刻本。故清嘉庆所刻大梁书院本,即为现存元氏著《续夷坚志》之祖本。

元氏中年时,金朝为蒙古所灭。此后二十余年元氏隐居乡间专心著述,倾全力保存金代的文化史料。从《续夷坚志》的内容分析可见,作者隐居期间,著书之余则通过耳闻目睹、阅读摘抄,不断积累各种史料,尤其是金元时期

山西地区的乡邦文献多有保存,可见作者的良苦用心。书中虽有一些神怪故事,但也记录了金代北方女真政权的史实和社会风貌,对于我们现今研究留存并不丰富的金代历史遗存及当时民风社情,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硯北草堂诗稿不分卷》

太原市图书馆馆藏《硯北草堂诗稿不分卷》是祁寯藻的一部诗集,为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稿本。

该诗稿共收录祁寯藻诗118首,多写山村风情如村雨、村雪、山花、秋景,乡村风俗如腊八、送灶以及对友人和兄弟们的赠诗等。该本由祁寯藻作序并钤盖有“祁寯藻印”。

祁寯藻(1787-1860),字仲寅,号渔庄,道光癸卯科(1843)举人,山西寿阳县平舒村人。一代史地宗师祁韵士之子,三代帝师祁寯藻之兄。祁寯藻科举道路并不顺利,五十余岁才得以中举。终其一生,主要是务农持家。祁氏兄弟感情深厚,在诗集中有多首他为弟弟们的赠诗。卷端楷书“硯北草堂诗稿受川祁寯藻仲寅”工整清逸,颇具文人气息,受川即为寿阳旧称。祁寯藻为其兄诗稿作序曰“丙子仲冬,藻自都下还里,昆弟团聚甚乐,无事辄分笺索句,至夜深三四鼓方睡。吾兄出示此卷,挑灯读之,小有评点。诗之工拙勿计,一时怡怡之情景,他日可念也。嘉庆二十有一年腊之念一日,弟寯藻识。”手足之情油然笔端。

案藻诗文大多风格清丽,乡村趣味浓,但也不乏瑰奇多变之作。寯藻是认真阅读过这本诗稿的,对其兄之诗圈阅评点多达五十余处,如《喜与五六弟夜坐》中评语“奇趣语似眉山”,即云其诗味如东坡。《李典余秀才以文来访盘桓数日别后寄此奉赠》中评“得风人规勉之意”,所谓风人即采集民歌风俗等以观民风的官员,意即此诗风格类似“风人诗”。古风《一叶落》评曰“佳句从长吉锦囊得来”,即谓诗风近诗鬼李贺;《送杜词》圈评“工于樵骚”,即诗风近于骚体。《拟王建田家留客》评语为“情景如画”,《秋日观稼》评曰“文人心思入微不入”,《关山月》评曰“佳唱不减旗亭画壁之白”,等等。比祁寯藻稍晚的著名学者张穆曾赞其诗“渔庄先生秉经缮文,彬彬有法,诗则古近体兼括众妙”“晋中罕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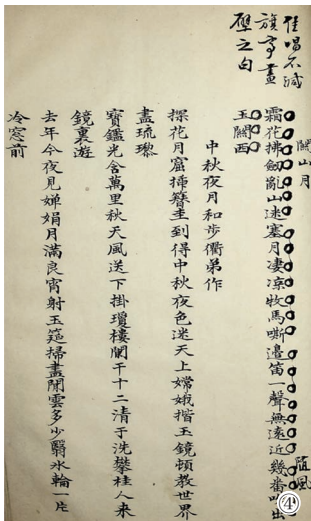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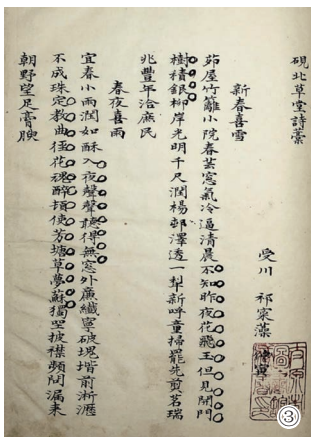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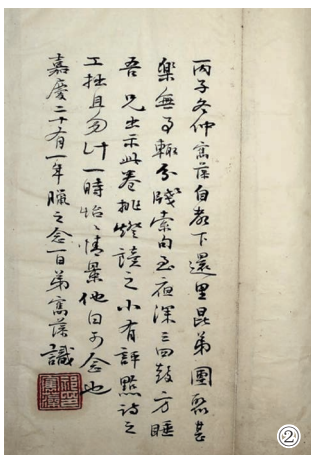
祁寯藻诗总体清新淡雅,贴近自然,颇具乡村气息,如《七律·新春喜雪》:“茅屋竹篱小院春,芸窗气冷逼清晨。不知昨夜花飞玉,但见开门树积银。柳岸光明千尺润,杨村泽透一犁新。呼童扫罢先煎茗,瑞兆丰年洽庶民。”该诗纯朴脱俗,通俗易懂,寥寥几十个字即勾勒出一幅山村喜雪图,也素描出了一位恬淡安适、内心却关心农事民生的乡村绅士形象。

再看一首他另外风格的诗《七绝·关山月》:“霜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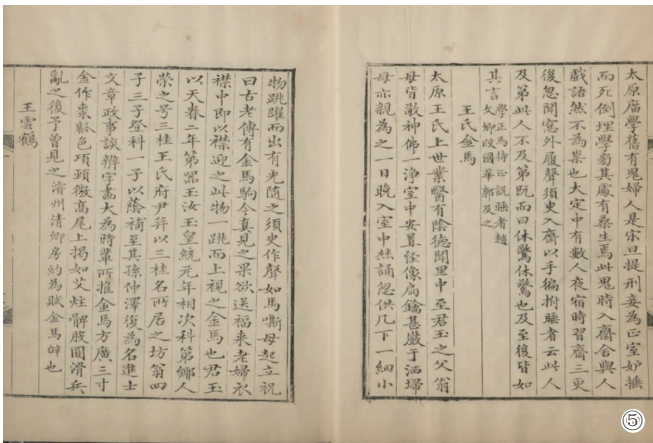
拂剑乱山迷,塞月凄凉牧马嘶。边笛一声无远近,几番吹出玉关西。”对于这首诗祁寯藻这样点评:“佳唱不减旗亭画壁之白”,所谓旗亭画壁也称旗亭赌唱、旗亭赌醉,在这一点上有着这样一个流传千古的诗坛佳话。这则故事,记载于唐代河东人薛用弱编撰的《集异记》中。唐开元年间,王昌龄、高适、王之涣这三位著名的边塞诗人,仕途之路都不顺畅,而生活经历又有颇多相似之处。在一个微雪的冬日,三位诗人一起到旗亭即酒楼小饮。忽然有梨园女子演奏,吟唱的都是当时有名的诗曲,三位诗人躲在角落里围炉听唱,并私下约定:“我们三个在诗坛上也算是有些名气了,可是一直未能分个高低。今日趁此机会,且听谁的诗人曲最多。”一位歌女首先唱道:“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王昌龄用手指在墙壁上画一道:“我的一首。”随后一歌女唱道:“开筵泪沾臆,见君前日书。夜台何寂寞,犹是子云居。”高适伸手画壁:“我的一首。”又一歌女出场:“奉帚平明金殿开,且将团扇共徘徊。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王昌龄又伸手画壁,说道:“两首了。”王之涣面子上有点下不来了。就对二位说:“这几个唱曲的,不过是‘下里巴人’俗曲,那‘阳春白雪’的高雅之曲,哪是她们唱得了的呢!”于是用手指最漂亮的歌女说道:“这个女子唱的可若不是我的诗,我甘拜下风;如果是我的诗,二位就尊我为师好了。”三位诗人说笑着,等待着。一会儿,轮到那个梳着双髻的最漂亮的姑娘唱了,只听她唱道:“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王之涣得意至极,手指王昌龄和高适笑道:“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三位诗人开怀大笑。旗亭画壁的故事表现出了盛唐诗人旷达争衡、知己相契的精神风貌。

祁寯藻一生布衣,务农持家,父亲和弟弟们的业绩掩盖了他的诗名,通过读这本他唯一存世的诗稿,人们能对他的才情有所了解。诗稿真实记录了清中期山西的乡村场景,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民情风俗和一位乡村诗人的耕读生活,加上祁氏兄弟的亲笔手书和题跋点评,更见诗稿的珍贵性,是研究寿阳祁氏文化不可多得的实证文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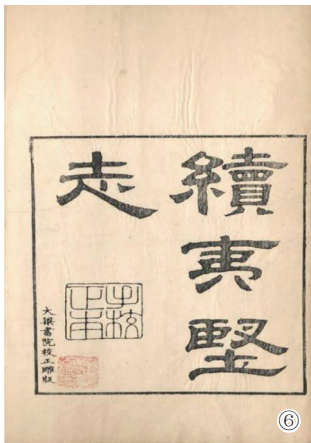
(太原市图书馆张潇、张利民/供稿)



①②③④为《硯北草堂诗稿不分卷》书影、内页



⑤⑥为《续夷坚志》书影、内页



浅谈“揭补”技艺在古籍修复中的运用

以修补《魏书》零页为例

□徐晓静(中国书店古籍修复中心主任)

文献学上著名的《魏书》版本

中国书店古籍修复中心曾接修过一页珍贵古籍,虫蛀很严重,书页中的文字主体还可辨读,首行可见“列传六十八”“魏书”等字迹,结合版式、行格、字体等特征,可以判断此页属于南宋“眉山七史”版本系统里的《魏书》。

“眉山七史”刻于南宋绍兴年间,是宋版书中“蜀刻大字本”的代表作。据南宋人晁公武所著《郡斋读书志》记载:

嘉佑中,以《宋》《齐》《梁》《陈》《魏》《北齐》《周书》外缘亡缺,始命馆职雠校。曾巩等以秘阁所藏多误,不足凭以是正,请诏天下藏书之家悉上异本,久之始集。治平中,巩校定《南齐》《梁》《陈》三书上之,刘恕等上《后魏书》,王安国上《周书》。政和中,始皆毕,颁之学官,民间传者尚少。未几,遭靖康丙午之乱,中原沦陷,此书几亡。绍兴十四年,井宪孟为四川漕,始檄诸州学官,求当日所颁本。时四川五十余州皆不被兵,书颇有在者,然往往亡缺不全,收合补缀,独少《后魏书》十许卷,最后得宇文季蒙家本,偶有所少者,于是七史遂全,因命眉山刊行焉。

从文中记载可见,北宋时曾由官府组织校刻了《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七部史书。这些书由于战争遭到了严重损失,几乎亡佚。南宋绍兴年间,井宪孟在四川为官时,搜罗当年所刊七史旧本重新刻板,由于书板镂刻于四川眉山(宋代三大刻书中心之一),因此这七部史书被后人统称为“眉山七史”。“眉山七史”的底本源自北宋官刻本,又刻于四川,具有珍贵的历史和文献价值,能反映宋代蜀刻本版式风格的特点,受到历代学者、藏书家的重视。这套书的雕板后来于南宋中期运到了浙江继续刷印,并曾在元、明两代进行了补板,将其中朽坏的雕板重新刊刻,今天能够看到的大部分“眉山七史”本都属于宋刻元明递修印本。此《魏书》零页也是属于宋刻元明递修印本。

书页破损情况及修复要点

从破损情况来看,该书页虫蛀比较严重,损伤面积在50%左右,部分文字有缺损,有原补纸和托纸,对照《古籍特藏破损定级标准》此书破损程度属于一级破损。由于流传已有数百年,书页的纸张有明显的自然陈旧现象,纸质却无严重酸化、絮化、霉变及机械强度下降等问题,为修补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

与大多数经过前人修复的书

页不同,该书页曾经整页托裱过,在重新修复前需要将托纸揭掉,但由于书页虫蛀破损严重,局部呈现出支离破碎的状态,揭托纸的时候需要格外小心,以免伤及原书页。经仔细检查,修复时采取以湿揭为主的方式把原补纸和托纸揭除,然后再进行修补,考虑到书页纸张未出现严重酸化、絮化、霉变及机械强度下降等问题,修复后将不再对书页进行托裱,此次修复的要点在于揭与补两个过程。

修复过程与分析

修复时,首先将书页润湿,利用水的分解和媒介作用,使纸张纤维膨胀而变软、黏合剂黏度降低,借着纸张湿润慢慢地一点一点揭下托纸,揭托纸的时候可借用镊子、竹起子及针锥等工具。若揭到难以揭开时,可再局部喷水闷润一段时间。喷水多少,一般是由书页和托纸的厚度、吸水率、黏合剂的黏度等方面决定的,喷水多则过犹不及,喷水少则起不到作用,都达不到理想效果。因此最好是事先做好基础判断,心中有数。喷水应呈均匀的雾状散落于书页上,先少喷,待纸“吃一吃”水分,再用镊子(或针锥)从位于边缘纸张松动的地方试揭,若揭不开,再喷一层水雾,水量浸透托纸,表面潮湿即可。喷水次数和水量视操作过程具体情况而定,没有绝对标准答案,要一次性做到“恰到好处”并非易事,需要足够的修复经验。

其次,揭托纸应首先寻找托纸与书页之间有空隙的地方,把镊子伸进空隙,揭下托纸,再顺着空隙和托纸松动的地方一点一点揭。如果揭到难以揭开的地方时,不能强行去揭,换个地方或者换个方向去揭,也可以换个工具试试。比如镊子夹不住的地方,可以试着用竹起子刮一刮,或者用手指轻轻搓一搓。古籍修复的方式方法以及所用的工具都是要灵活运用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修复工作既严谨又灵活的一面。

原补纸和托纸揭掉后,待书页自然晾干,就会看到书页原来的“面貌”。然后根据书页纸张检测结果,结合经验,遵照修复要求和预期要达到的效果等因素,综合衡量,选配合适的修复补纸。此书所选用的是色泽微微泛黄的纸作为补纸,薄皮纸作为溜口纸。我们知道,选配与原书页纸张百分百完全契合的纸作为补纸,这样的几率极其微小,所以在选配补纸时,重点选配与原书页各种数据、质地、颜色等方面最接近的纸张作为修复补纸。补纸选用原则是“宁浅勿深”“宁厚不薄”。

接下来,按照修复要求进行补破和溜口即可。修补的顺序是先补书口部位,以固定“大骨架”。书口要彻底展开,有些书页打开后,书口会有收缩现象,不能完全舒展,这时需要喷水,用手掌或手指轻轻向两端拉伸,力度要小,千万避免因力度过大造成二次破损,也可以借助润潮的宣纸铺在书口位置,用手适度碾压展平;有些书口是完全断裂的,需要把两个半页摆平直,中间书口位置留出“毫发之际”(约1毫米宽度的间距)用于对折书页;有的书口处于部分断裂,需要打开书页,顺着未断裂的书口状态自然展平,书页不扭曲不较劲即可。待书口位置固定好了,有缺失的用补纸进行修补,无缺失的书口单薄的可以溜口加固。再修补破洞,先补大再补小。如有几个甚至很多虫蛀连成一片的,不必一个一个补洞,可以当成一个大的破损补一块相应面积的补纸。补纸与原书页搭边(或叫搭茬,就是补纸与书页粘连而重叠的边缘。)宽窄要合适,不能太大,太大增加了不必要的材料给书籍造成“负担”,但是,有时遇到破洞很大或整册书虫蛀在同一位置呈贯穿状时,搭边适当放宽一些也未尝不可。

最后,尊重委托方的合理要求,特殊保护装裱,书页不再恢复成原来的筒子页,而是作为展开的单页,四周加宽,装在镜框里单独保存。所以,在修复中省却了沿书口旧痕进行折页、上压力压实以及装订的过程。

虫蛀作为古籍一种常见的破损情况,一直让读书人、藏书人深感苦恼。明代张岱在《娜嬛文集·讨蠹鱼檄》对蠹鱼蛀书进行了批判,充分表达了古代读书人对蛀虫的愤恨。即使修复过的古籍,如果保存不当,依然会再次遭到虫蛀,所以做好书籍的保护工作、避免书籍生虫同样非常重要。从古至今,人们采取了越来越多、越来越科学的方法来避免虫蛀。古人曾采用天然香料植物灵香草、芸香草等进行藏书的驱虫防虫,香气高雅,对藏书和人体无毒无害;还有用万年红以及糨糊里面掺花椒水等防虫;也有在古籍或古籍书柜中放置老旱烟(即叶子烟)防止蠹虫,据说效果也不错;书库还要经常通风防止潮湿生虫;还有曝书节曝书活动,通风防潮以防虫。今人有用樟木书柜存放书籍防虫又防潮;还有用真空技术包装古籍善本等。另外,控制书库的温湿度对古籍的保存保护也很重要,一般温度在20度左右,湿度在50%左右。总之,希望在古籍保护保存过程中继续加大防虫防潮的力度,降低虫蛀的风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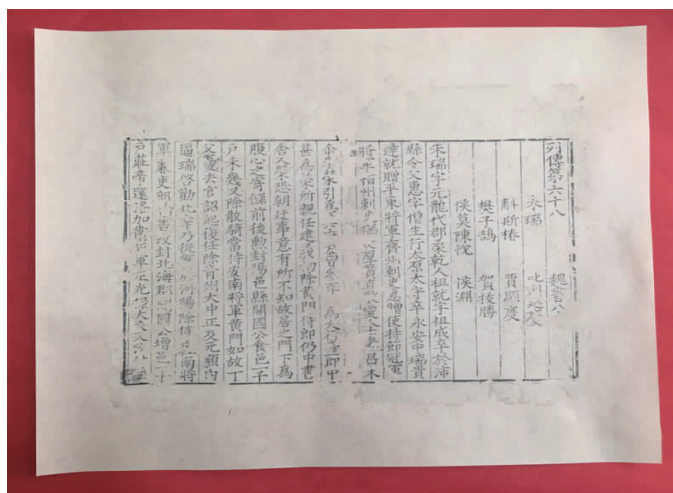
修复前



揭原托纸



揭下的原托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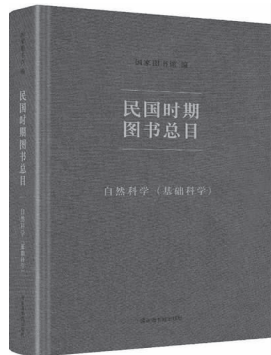


修复后

满足读者对民国时期文献数据的实时查询需要 《民国时期图书总目》编纂情况

丛书《民国时期图书总目》主要收录从1911年到1949年9月我国出版的中文图书(酌情收录这段时间内国外出版的中文图书),是一部大型的回溯性书目。该丛书按学科分卷,分册编辑出版。按照书目数量的多寡一个学科编成一册或数册;或由若干学科合成一册。每卷之后均附有书名索引,以便读者核查使用。该丛书最新出版了自然科学(基础科学)分卷,主要收录有关自然科学方面的中文图书5000余种。

《民国时期图书总目》主要收录1911-1949年9月我国出版的中文图书。基于目前普查情况统计,在这段时期里,我国出版的中文图书有20余万种。20世纪80-90年代,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曾编过一套《民国时期总书目》,主要收录了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和重庆图书馆收藏的中文图书,并补充了一些其他图书馆的藏书,基本上反映了这段时期中文图书的出版概貌。《民国时期总书目》由原北京图书馆参考研究部



《民国时期图书总目·自然科学(基础科学)》
编著者:国家图书馆 编
出版社: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6月
定价:380.00元

自1961年开始组织编纂,编委和顾问主要成员包括田大畏、王润华、邱崇丙、朱光暄等,1985年开始分卷册陆续出版,为民国时期的书目存录、学术研究和文献

保护提供了便利。前辈专家学者严谨求实,为民国时期文献整理和保护事业做出卓越贡献。

《民国时期图书总目》是在参与民国时期文献普查的各个机构的大力支持下,依托“民国时期文献联合目录”,并吸收了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各省级会员馆、“大学数字图书馆国际合作计划”(China Academic Digital Associative Library, CADAL)的主要高校成员馆以及一些专业图书馆等民国时期文献主要收藏机构的书目数据基础上编纂而成。在收书范围、书目分类、著录方式及编纂体例上,大体延续了《民国时期总书目》的做法,同时根据目前书目数据的实际情况进行了一些调整。从书目的完整性、藏书机构的代表性等各方面都较《民国时期总书目》有了显著的提高。此外,本书目一大特色是待陆续出版完成后将实现与“民国时期文献联合目录”线上数据联动,以满足在数字时代大背景下读者对于民国时期文献数据的实时便捷查找、识别、选择和获取。

本书目基本依据《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四版)体系,按学科分为哲学,宗教,社会科学总论,政治,法律,军事,经济,文化、科学、教育、体育,语言文字,文学理论、世界文学、外国文学,中国文学,艺术,历史、地理,自然科学(基础科学),医药卫生,农业科学,工业技术、交通运输、航空航天、环境科学,综合性图书18卷,将分卷陆续出版。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图书馆编目工作发生了巨大变化,编目方式由卡片目录发展为机读目录,各藏书机构间的书目交流也日趋频繁和便捷。如何以海量的机读格式书目数据为基础,编纂一部大型的印刷本回溯性书目,对于编纂人员来说充满挑战,实施过程复杂且动态,不易掌控,而且这部书目涉及的藏书机构多、书目数据量大、图书版本情况复杂、涉及学科范围广,有一些图书破损严重,著录信息无从查起,需要编纂人员考证或推测,加之编纂人员水平有限,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珍本玉篇音义集成》
编校者:(南朝梁)顾野王 编著,
吕浩 校点整理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4月
定价:480.00元

清代以前《玉篇》流传简史

1400多年前,南朝梁顾野王“总会众篇,校雠群籍”,编成了影响整个东亚文化的《玉篇》。《玉篇》上承许慎《说文解字》与吕忱《字林》,更加凸显了小学之要,却由于卷帙浩繁而不便传抄通行。至唐上元元年,处士孙强增字减注而成“上元本”。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陈彭年等在上元本基础上增删校订而重修成《大广益会玉篇》。明代朱祐檠增加3772字编成《新刊大广益会玉篇》(益藩本)。《玉篇》系列字书繁衍滋生,流布海内外,形成了蔚为大观的“玉篇书系”,在汉语史、辞书史、汉字传播史、汉文化传播史上发挥了突出作用。

《玉篇》版本众多,今存版本六十余种,其尤其可宝者有原本《玉篇》残卷、敦煌《玉篇》残卷、宋本《玉篇》及元本《玉篇》。

原本《玉篇》残卷是指日藏《玉篇》写本残卷,国内较为通行者为中华书局影

印本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本。中华书局本把罗振玉影印本(含卷九、卷二十四和卷二十七)和黎庶昌刊本(含卷九、卷十八、卷十九、卷二十二和卷二十七)合为一编,又补入东方文化研究院卷八心部残卷,但黎本卷二十七只收后半段。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本后出转精,是原本《玉篇》残卷搜集最全的版本,只是鱼部存在错简。另外,《续修四库全书》本还有几处残片遗漏,本次集成补入了车部及鱼部三个片段若干字条。

敦煌《玉篇》残卷分藏于俄罗斯和英国。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今彼得格勒)分所藏彡部六字、须部五字、彡部一字(陈祚龙:《敦煌古抄文献会最》,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版),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藏彡部二字,文献位于编号为S.6311的《佛说善恶因果经》纸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英藏敦煌文献》,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敦煌残卷虽然残存字条较少,却是考察《玉篇》系文献演进与传承,尤其是考察原本《玉篇》和《篆隶万象名义》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对解决《玉篇》研究领域的若干重大问题也能起到积极作用。

宋本《玉篇》,学界直以泽存堂本当之,实际上泽存堂本在字形、注音、义训上都有较多改动,尤其不可取的是以《类篇》义训补宋本《玉篇》中有音无义的字条,因而泽存堂本已失宋本《玉篇》之旧貌。今传世宋本《玉篇》有两个版本,一是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版玉篇》(宋十行本),二是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本《玉篇》残本(宋十一行本,存卷首和正文卷一大部分)和日本

存卷六至卷三大部分)。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版玉篇》的形制与泽存堂本相似,字条首尾相接,横向无序;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和日本内阁文库藏本属于同一版本系列,为十一行本,形制与《宋版玉篇》不同,表现为横向也成行,字序与字条内容多寡都有所调整。宋十一行本虽形制与元代《玉篇》形制相似,但字条说解内容绝不像元代《玉篇》那样简洁,而是与《宋版玉篇》大体一致。宋本《玉篇》流布甚广,版本众多,对东亚汉文辞书的影响最大,因而其研究价值也毋庸置疑。上述两种作为宋本《玉篇》的两种样式,代表宋末《大广益会玉篇》刊本的基本面貌。

清扬州诗局本《玉篇》

清代《玉篇》最为通行的是泽存堂本,新安汪氏本、新化邓氏本、咸丰年间刻本、小学汇函本、上海蜚英馆石印本、喻义堂本等都祖述泽存堂本。但泽存堂本的问题已如前所述,难以代表宋本《玉篇》,这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清代《玉篇》另一个版本——扬州诗局本(清曹寅棟亭五种本)的珍贵价值。

今见曹氏棟亭五种本《大广益会玉篇》有四册本、五册本、六册本。南京图书馆藏有四册本和六册本,两种版本内框皆为16.2cm×10.8cm,版本相同,称“扬州诗局本”。左右双边,每半叶八行,行十六字,小字双行,行小字二十字,白口。各卷末有木记曰“棟亭藏本丙戌九月重刻于扬州使院”。本次整理以四册本为底本。

从数量上看,扬州诗局本国内外馆藏数量少。从版本学及文献学等方面来考

虑,扬州诗局本在清代《玉篇》诸版本中可谓独树一帜,更显珍贵异常。作为《四库全书》的底本,扬州诗局本自然有其独特的文献价值。虽然此版本在版式上与传统宋本有诸多不同,如每半叶八行(宋本及泽存堂本皆十行),版心无鱼尾,也无刻工、字数等信息,敕牒则更完整,三十卷总目皆集中于正文前;但是这些版式及附件上的差异掩盖不住其文献价值,因为这个版本在收字、字形、音义等方面基本保留了宋本《玉篇》原貌,只是做了适当的订讹。这个结论可以在与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版玉篇》的对比后得到印证。

扬州诗局本此类订讹有七百余处,不一一列举。可以说,在《玉篇》音义资料的准确性方面,扬州诗局本甚至胜过书陵部本,因而本书以扬州诗局本为字条基本资料,纂集珍本《玉篇》音义。

《珍本玉篇音义集成》以扬州诗局本为统领,每一字条下配以圆沙书院延祐本(元代最早刊本)、原本《玉篇》残卷、敦煌《玉篇》残卷和《玉篇》佚文,(原本《玉篇》残卷及《玉篇》佚文内容又见于拙著《〈玉篇〉文献考述》附录)。此次音义集成成为读者对比之便利而保留残卷及佚文数据。此外,日藏残卷内容增补了车部、鱼部三个片段,是为“总会众篇”;校以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版玉篇》、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和日本内阁文库藏宋本《玉篇》、张氏泽存堂本、圆沙书院泰定本、至正丙申本、至正丙午本、建安郑氏本、建安蔡氏本、詹氏进德书堂本、四部丛刊本、明经厂本等;参校文献有《说文解字》《篆隶万象名义》《广韵》《类篇》《玉篇校释》,其他还有《庄子》《山海经》《左传》《国语》《汉书》等,是为“校雠群籍”,以期有功于小学焉。

走近明清之际的“百科全书派大哲学家”方以智



《方以智全书》(全十册)
作者: (明)方以智
编者: 黄德宽、诸伟奇主编
出版社: 黄山书社
出版时间: 2019年6月
定价: 1200.00元
ISBN: 978-7-5461-7850-9

方以智是明清之际杰出的思想家、科学家,通晓中国传统自然科学和当时刚传入的西方近代科学,对天文、地理、历史、物理、生物、医药、文学、音韵等都有研究,著述宏富,影响深远,其学术贡献对后世的影响,以及由此而确立的历史地位,皆足以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相并峙,被誉为“中国十七世纪罕见的百科全书派大哲学家”,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杰出人物之一。《方以智全书》系方以智全部著述的首次点校整理出版,包含子书36种,共314万字,涵盖哲学、天文、物理、医学、语言、文学等诸多领域。

版本极珍稀

《方以智全书》系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重点项目、教育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重大项目。方以智一生著述极其宏富,然而由于其明遗民身份以及清廷文字狱的残酷,其著作多在禁毁之

列。多数著述赖方氏后人以家传抄本形式世代珍藏,后捐献给政府,外界难得一见。

整理难度高

《方以智全书》系方以智著作第一次全面系统的校点整理出版,历时30多年,其中20余种三百多年来从未刊行。《全书》尽量收全其著作,涵盖哲学、天文、物理、医学、语言、文学等诸多领域,选用最好或最恰当的本子作为校点底本,并广校众本,审慎去取,精审标点。

出版意义大

方以智是明清之际杰出的思想家、科学家,著述宏富,影响深远。近百年来,对方以智的研究渐成海内外学术界之热点。对其著作的全面搜集、整理出版尤为学界所关注和企盼。《方以智全书》的出版,不仅能极大推动方以智及桐城方氏研究,也会带来明清思想史、学术史、科技史乃至文学史研究的新气象。

编者简介:

黄德宽,安徽大学原校长、党委书记,教授,现任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常务副主任、安徽省文史馆馆长。主要从事中国文字学、古文字学教学和研究工作。先后主持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九五”重点项目《商周秦汉文字发展谱系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汉字发展通史》等。学术著作有:《古文字学》《汉语文字学史》等。1998年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一、二层次),2007年、2008年、2011年三次入选中国杰出社会科学家。成果曾入选国家优秀成果文库,多次获得国家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教育部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省优秀教学成果特等奖、一等奖,省社会科学文艺出版奖一等奖和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等奖励。

诸伟奇,安徽大学教授、安徽省文史馆馆员、安徽省朱子研究会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文献学、明清学术史及古籍整理出版学。已发表论文多篇,出版《中华大典·古籍目录分典》《古籍整理研究丛稿》等著作多部。

远可鉴历史,近能征实事 《近现代汉语辞源》编写缘起

□黄河清

汉语外来词有三类:一是西汉时期的西域外来词;二是东汉以后的佛教词语;三是明末清初以后受西方文化影响而产生的词语。前两类词研究成果比较多,但最后一类比较少,至少在20世纪90年代是如此。例如《汉语大词典》这方面的条目,大多缺少书证或书证偏晚,词源考证比较滞后。其实,明末清初以后产生的这类词,对现代汉语的影响很大,远远超过前两类词。所以研究这类词,无疑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有鉴于此,20世纪90年代初,香港中国语文学会创办《词库建设通讯》,专门讨论近现代词语,我有幸也参与其中,写了一些有关外来词的文章。也是在这个时候,意大利学者马西尼(Federico Masini)出版了《The 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Lexicon and its Evolution Toward a National Language: The Period from 1840 to 1898》。此书是马西尼研究近现代汉语新词的力作,它以西方学者的视角,来审视和梳理近现代汉语中的新词,从理论到方法都十分新颖。遵香港中国语文学会理事会主席姚德怀先生之嘱,我将此书译成了中文,译本取名为《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并于1997年由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马西尼的著述很有洞察力,它揭示了近现代汉语新词研究中存在的许多问题。此书对我以后编著词典,影响颇大。

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我把研究范围锁定在16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即从利玛窦来华开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350多年的时间里,随即就开始搜集资料,主要集中在来华传教士的汉语著作或刊物,中国人的使西、使东游记等。这中间尽量注意各个时期的平衡性,也就是说,

350多年这一时间段里早中晚各个阶段都要有代表性的文献。同时还注意学科的平衡性,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的文献尽量兼备。最后汇总的文献780多种。

1998年春,在香港中国语文学会的资助下,我建立了《近现代汉语辞源数据库》(以下简称《数据库》)。这样,词语的收集工作便开始了。我一边阅读文献,一边摘录词语,并将书证录入《数据库》。凡被录入《数据库》中的书证,均要比《汉语大词典》的早。如果晚的,一律不收。有的书证还可以弥补《汉语大词典》没有书证的缺陷。在每个书证前面,我还标记了年份。

经过几年的努力,《数据库》里积累了一定数量的条目。在香港中国语文学会的统筹和资助下,我试编了《近现代汉语新词词源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1)。该词典收词虽然只有5000多条,但出版后得到了各界的好评。9年之后我又编了《近现代辞源》(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此书由姚德怀审定。这次收词有所增加,共9000多条。《近现代辞源》的出版也得到了许多好评,如不少学者认为,此项工作填补了汉语词源研究领域的空白,同时也肯定了词典的原创性。当然也收到了一些意见和建议,如日本学者认为词典收词范围还应该进一步扩大,对日源词应指出词源,等等。

对于学界的意见和建议,我觉得十分中肯,而要做到这一些,当时在客观上已经具备了条件,因为《数据库》中已有了84000多个条目,从中选出半数条目,再编一部大型词典,已完全可能。在上海辞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我又开始了新的征程。通过整整5年的努力,终于有了现在的这部《近现代汉语辞源》。

《近现代汉语辞源》收词43000条,共647万字。该词典不但收录语文性词语,

如现实、现状、情绪、具体、抽象、越权、允准、共勉,等等,还收录了百科性词语,例如彩陶文化、百日维新、普法战争、红十字会、八小时工作制等。《近现代汉语辞源》除收录外国地名外,还收了外国人名,如哥白尼、哥伦布、伽利略、达尔文、牛顿等。这些词语代表了一种文化、一种事业、一种运动、一种思潮、一种人生,即便是一场战争,它也有着许多文化内涵,当然更多的是血的教训,远可鉴历史,近能征实事。这些词语的收录,对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近现代汉语辞源》还有一个亮点,就是除了现在常用的词语外,还收了大量历史词。如在严复、梁启超的一些论著中,我读到了“佛兰金仙”这词,开始时并不在意。但梁启超在《保国会演说词》(1898年)中有两处对“佛兰金仙”进行了描写。梁先说:“英人乌理西(英之子爵,今任全国陆军统帅)谓中国如佛兰金仙之怪物,纵之卧则安寝无为,警之觉则奋牙张爪。”接着又说:“汤之、决之、策之、鞭之,意者佛兰金仙其犹有将醒之时。”读了这两句话,我顿时感到这词的重要性,因为“佛兰金仙”很容易能与“睡狮”联系起来。其实,“佛兰金仙”是英语中的Franken。Franken或Frankenstein是一个创造怪物而自己被它毁灭的医学研究者,是英国女作家Mary W. Shelley(1797-1851)于1818年所著同名小说中的主人翁。后来Franken或Frankenstein用来指人形怪物。“佛兰金仙”前三个字是音译,后面的“仙”是外加的,试图对这种怪物有个说明(尽管这种说明不是很合适,有点美化)。因此,考证“佛兰金仙”“睡狮”这些词语的产生,对于研究当时中国社会那种麻木不仁、嗤嗤鼾睡的状态,能起到一个旁证的作用。所以,这类文化内涵丰富的历史词,常常是《近现代汉



《近现代汉语辞源》
作者: 黄河清
出版社: 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20年5月
定价: 980.00元

语辞源》捕捉的对象。

作为一部词典,其收录的词语不但要有一定的量,而且还要有一定的涵盖率。所谓涵盖率,就是词典中的词语涵盖人类文化各个领域的比率。但《近现代辞源》在这方面做得不是很理想,至少学科词语的分布还不均衡,如地理词语多,历史词语少;音乐词语多,美术词语少;几何词语多,代数词语少,等等。另外,从时间段来说,《近现代辞源》对于17世纪后半期到19世纪初和20世纪40-50年代这两段时期的词语,收录相对少了些。该词典所收的多数是19世纪中到20世纪20-30年代这段时期的词语,特别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这一二十年间的词语,虽然这段时期的新词确实比较多,但相比而言,其他时段词语的收录还是少了。就语种来说,来自俄语的外来词也少。而这些问题在《近现代汉语辞源》中都有了改善。

《梁书》修订本:古籍整理事业的又一重要成果



作者:(唐)姚思廉撰,卢振华、王仲荦
点校,景蜀慧、赵灿鹏修订
出版社:中华书局
出版时间:2020年6月
定价:180.00元
书号:978-7-101-14398-0

《梁书》共五十六卷,包括帝纪六卷、列传五十卷,是唐朝姚思廉撰写的纪传体断代史,记述了南朝梁王朝自开国至灭亡五十六年的历史,是唯一完整传世的梁代史籍。中华书局本次出版的《梁书》是原校本的全新修订升级本,集合了学界近五十年研究成果。限量精装,每套均有收藏纪念号,附藏书票。

梁朝是南朝萧齐之后,由萧衍建立的政权。《梁书》署名姚思廉撰,实为姚察、姚思廉父子相继编撰而成。

姚察于梁朝末年年开始协助修撰国史。入陈后历为史官,负责编撰梁史和陈史。隋开皇九年(589),姚察受敕编撰梁陈二代史,未成书而卒,临终令子思廉续成其志。姚思廉大业年间接手补续梁陈二史,后因战乱,亦未成书。唐初修南北朝诸史,姚思廉奉诏撰修梁、陈二史,至贞观十年正月撰成。《梁书》和《陈书》的修撰,历经陈、隋、唐三朝,“更数十岁而后乃成”。如果从陈末姚察负责编撰梁史算起,至唐贞观十年成书,姚思廉父子撰写《梁书》的时间,前后通计有五十余年之久。

在姚察、姚思廉父子撰成《梁书》之前,已经有多种梁史存在,但今都已亡佚,完整传世的梁代史籍,仅有姚思廉《梁书》一种。姚思廉《梁书》主要依据梁朝史官所修国史,“又采谢灵等诸家梁史续成父书”,对前人相关史著也有吸收。

中华书局点校本“南朝五史”由山东大学王仲荦先生总负责,《梁书》由卢振华先生点校,宋云彬、赵守俨先生先后承担编辑整理,1971年前基本完成点校和编辑工作,1973年出版。点校本以商务印书馆据宋大字本影印的百衲本及南监本、北

监本、汲古阁本、武英殿本和金陵书局本互校,择善而从,同时亦参校了《南史》《册府元龟》《资治通鉴》和《资治通鉴考异》等典籍。对前人的校勘成果,则主要采用了张元济、张森楷的两种《梁书校勘记》稿本,以及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等书。点校本比较广泛地参校了各种版本,综合前人著述,对清代以来学者的校勘成果汲取尤多,在标点、分段、校勘订误等方面都有不少创见,出版后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好评,为目前最为通行的整理本。

此次修订以商务印书馆据北平图书馆藏宋大字本(阙卷以上海涵芬楼藏元明递修本配补)影印百衲本为底本,以台北“国家图书馆”藏原北平图书馆宋大字本缩微胶片(原书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著录作宋绍兴间刊明初修补本,已与原书作比对照)为首要之通校本,以弥补百衲本因描润校改有失古本原貌的不足。作为通校本的,还有《中华再造善本》影印上海图书馆藏宋刻宋元明递修本,以及与底本系统不同,在百衲本问世之前较为通行的清武英殿本。鉴于《中华再造善本》影印上海图书馆藏宋刻宋元明递修本有少量阙叶,又以中国国家图书馆(两种)、台北“国家图书馆”、日本静嘉堂文库及内阁文库所藏五种宋刻宋元明递修本作为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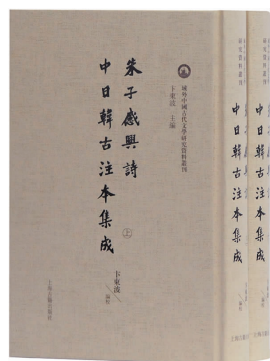
充,以明南监本、北监本、汲古阁本、清金陵书局本为参校本。

修订工作在原校本基础上进行,遵循《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作总则》和工作程序,纠正原校本中的讹误遗漏,统一体例,弥补不足,对原校本作适当修订和完善。在充分尊重原校本成果的前提下,清理复核了原校本的全部校勘记。原校勘记无误者,保留沿用;可补充新的文献证据者,适当补充改写;有误者加以订正并另拟校勘记;确实无必要者则予以删除。原校本对底本有重要改动而未出校记以及少数失校之处,修订本酌情补加校勘记。同时遵照《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标点分段办法》,修改完善标点,对个别分段进行了适当调整。

此次修订高度重视古今学者的学术成果,对清代以降尤其是点校本《梁书》出版以来学术界的校勘与研究成果广泛收集并充分参考和采纳吸收。

修订主持人景蜀慧为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研究方向为汉魏晋南北朝的文学与思想学术、中古疾病医药史及南朝史籍文献等。修订负责人赵灿鹏为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教授,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史、宋史、中国思想文化史与古文献学研究。

展现朱子对东亚文化圈深远影响之作 《朱子感兴诗中日韩古注本集成》出版情况



《朱子感兴诗中日韩古注本集成》
“域外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之一
编校者:卞东波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11月
定价:168.00元
ISBN:978-7-5325-9355-2

南宋理学家朱熹的《斋居感兴二十首》是一组曾产生深远影响的作品。因为属于“语录讲义之押韵者”,文学性有限,故当代研究寥寥,但从东亚汉文化圈交流与东亚朱子学史的角度来看,意义重大。《朱子感兴诗中日韩古注本集成》由南京大学文学院卞东波教授所编校,汇集了8种中国注本、4种日本注本、4种朝鲜注本,比较全面地展现了朱熹《斋居感兴诗》在东亚范围内的地位,展现了朱子对东亚文化圈思想与文学的深远影响。

朱熹是中国具有世界影响的思想家与文学家,其思想在中国从元代以后一直是官方的意识形态,同时也对同属东亚汉文化圈的日本、朝鲜、越南诸国产生巨大的影响。应运而生的朱子学成为东亚近世社会共同的思想平台与价值体系,东亚诸国

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东亚朱子学。同时,朱子的文学思想与文学创作也影响了整个东亚。

《斋居感兴二十首》(以下简称《感兴诗》)是朱子理学诗的名作,该组诗以韵文的形式全面表达了朱子学的核心思想,包括宇宙观、历史观、正统论、持敬观、对科举与佛老之态度、对经学文献舛乱之看法等。古人尝云:“予观朱子《感兴》之作才二十篇耳,天人禀赋之理、圣贤传授之旨、异端悖谬之失、俗学支离之陋,与夫千古史学难决之是非,而超然得于独断之余者,率于此发之。诚无愧于三百篇之作矣。”(夏尚朴《夏东岩先生文集》卷二《书感兴诗后》)这段话较好地概括了《斋居感兴二十首》的内容与主旨及其在学术史上的独特地位,甚至认为其诗不亚于《诗经》之作。还有学者将其与其他的理学经典著作并列:“此诗究极道体,纲维世教,与《太极图》《通书》《近思录》维相表里,指示学者甚切也。”(胡炳文《感兴诗通》末引宋人胡升语)宋人王埜云:“先生此诗,凡太极阴阳之理,天理人欲之机,古今治乱之分,异端末学之辨,精粗本末兼该并贯,加以兴致高远,音节铿锵,足以追俪风雅。学者优游讽咏,良心善性,油然而生”(胡炳文《感兴诗通》末引),从哲理、文学与教化的层面概括了《感兴诗》的多重价值。

因为《感兴诗》义理比较深奥,使用的典故也比较多,故在中国从宋代开始就有多种注本,现存的尚有蔡模《感兴诗注》、何基《解释斋居感兴二十首》、刘履

《选诗续编补注》中的注释、熊刚大《性理群书句解》中的注释、胡炳文《感兴诗通》、吴曰慎《感兴诗翼》等。更为难得的是,《感兴诗》不但在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涌现了数量众多的注本、追和诗以及评论资料;而且在日本与朝鲜半岛也激起了较大的反响,亦产生了众多注本、唱和诗和评论资料。在中国学术史上,没有一部作品能够像《感兴诗》在东亚文学史上能够拥有如此多的注本,吸引了众多东亚士人长达几百年的关注。《感兴诗》之所以得到强烈的关注,与这组诗集中地以文学的形式展现朱子的核心思想有关,因而东亚三国对《感兴诗》的注释与评论也是研究东亚朱子学的重要资料。细绎东亚这些《感兴诗》的注本与评论,不但可以读到它们对《感兴诗》语汇与诗意的细致解释,而且可以看到它们对《感兴诗》主旨的解释并不相同,从而体现了东亚朱子学的不同侧面。

《感兴诗》可能是中国文学史上得到最多注释的单篇文学作品,流传至今的东亚古注本就有近二十种。而且从宋代起,就有诗人开始追和《感兴诗》,一直到清代及朝鲜时代末期还不断地有人追和,这些和诗努力模仿《感兴诗》的风格,有的还加以创新,从而形成了一个渊远流长的“感兴诗谱系”。东亚汉籍中还有大量“读论朱子感兴诗”之类的题跋。这些评论或就《感兴诗》全诗大意加以阐发,或就《感兴诗》中具体的文字予以考订,或讨论《感兴诗》某句诗的意思,或以《感兴诗》为中心阐发朱子的思想。这些都是研究《感兴诗》文学与

思想的珍贵文献。

《朱子感兴诗中日韩古注本集成》汇集了编校者从中国、日本、韩国、美国各图书馆中收集到的所有有关《感兴诗》的汉文注本,既包括中国的明清时代的刻本,又包括和刻本、日本钞本、朝鲜本等域外文献,其中不乏罕见的珍贵文献,如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所藏的朝鲜清州牧刊本蔡模《感兴诗注》,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刻本明炳文《感兴诗通》,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所藏江户初期儒学家林鹤峰的《感兴诗考》,九州大学图书馆所藏的日本钞本《感兴诗笔记》《感兴诗考注纪闻》,韩国、日本所藏的朝鲜本《朱文公先生斋居感兴诗诸家批注集览》以及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的和刻本《感兴诗考》、朝鲜本《朱子感兴诗诸家集解》等。此外,编校者又择要汇集了东亚汉籍中有关《感兴诗》的唱和资料与评论资料。通过这些文献可以透视东亚三国学者对《感兴诗》的不同理解以及东亚朱子学的不同特色。本书前有编校者研究《感兴诗》在东亚三国流传与影响的长篇前言,可以以此了解《感兴诗》在东亚汉文化圈的经典地位。

本书不但对宋代文学研究、朱子文学思想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且对于研究宋明理学、中国思想史、东亚朱子学、东亚汉文学都有不可或缺的文献价值。本书是编校者主编的《域外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的第一种,下面会陆续推出域外有关《诗经》、寒山诗、杜诗、东坡诗、山谷诗等的研究资料,希望以此来推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进一步拓展。